


---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

福柯的生死爱欲

---



〔美〕詹姆斯·米勒 著  
高毅 译

# 福柯的生死爱欲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美] 詹姆斯·米勒 著 高毅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的生死爱欲/(美)米勒( Miller, J. )著;

高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书名原文: 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

原出版者: Anchor Books

ISBN 7-208-04778-2

I. 福... II. ①米...②高... III. 福柯

(1928~1984)—传记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4221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秦爱华 姚映然



世纪文景

---

福柯的生死爱欲

[美]詹姆斯·米勒

高毅译

---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cwcn.cn)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600,000

版 次 200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4778-2/B·397

定 价 45.80元

---

# 目 录

序 / 1

第一章 作者之死 / 1

第二章 等待戈多 / 15

第三章 袒露的心 / 27

第四章 谋杀之城 / 39

第五章 在迷宫里 / 51

第六章 残酷无情 / 63

第七章 惨不忍睹 / 75

第八章 求知意志 / 87

第九章 战斗呐喊 / 99

第十章 改写自我 / 111

第十一章 他的秘密 / 123

后 记 / 131

关于资料来源和译文的说明 / 133

注释中使用的缩略语 / 135

致 谢 / 141

作者简介 / 147

译名对照表 / 149

# 序



书不是传记,虽则它大体上遵循着福柯的生命足迹。它也不是关于福柯著作的综述,尽管它的确对福柯的大量作品作了诠释。它毋宁是在叙述一个奋斗的人生,这种奋斗旨在实践尼采的箴言:“成为自己”。

透过轶闻和释文的交织,我对福柯的作品和生活进行了探索。他的作品像是在表达一种实现某种生活形式的强烈欲望,而他的生活则似乎体现了一种将这欲望付诸现实的执着努力,这努力已获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以一名好盘根究底的记者的兴致,搜集了有关福柯生活的各方面情况,这些情况至今尚无文证,故而大都未经检验。本着一名思想史学者的兴致,我又对这种生活的文化社会背景作了一番透视。我还以一名文学批评家的兴致,对时常萦回在福柯脑际的一些幻觉和想像的迷念(正是这些东西赋予福柯的文章和日常起居以个性的色彩和基调)作了突出的描绘。我的目的,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讲,是构想出这样一种人,他“既非纯粹的语法主体又非深层的心理主体,而是那种在著作、信函、草稿、写作提纲及个人隐私中说‘我’的真实的自我”。<sup>①</sup>

1987年,即福柯逝世三年后,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当时有一位专家曾警告我,说我可能是在白费工夫。他的文件我拿不到手,他的朋友又不会跟我谈,我的采访可能一无所获。

那时已经出版的一本迪迪埃·艾里邦(Didier Eribon)写的福柯传记,对我颇有助益。就在我动笔撰写的时候,另一本由戴维·马塞(David Macey)作的福柯传也准备付梓了。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我居然和福柯的大量旧友都谈过了话,了解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看到了不止一份的珍稀资料。我觉得我并没有白费工夫。<sup>②</sup>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位警告过我的专家还是对的。为福柯写一部盖棺论定的传记,的确为时尚早。还有太多的证人没有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



## 福柯的生死爱欲

来；而更糟的是，还有太多的资料未曾公开发表。

福柯在1984年去世之前，曾销毁了大量的个人文件。在遗嘱里，他还禁止在他死后发表一切他无意中留存下来的文稿。迄今还没有出现福柯的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虽然巴黎已建立起一个专门研究他的机构，但那里的资料并不充足。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福柯的各种短文和答记者问正以好多种文字广为流传，而登载这些东西的出版物，有些很难弄清来自何方。现已有人允诺用法文按年代顺序出版福柯的短文及谈话全集，这套书将最终改变人们对他的著作的看法。但即使到了那时，也还会有更多的材料需要研究。他的长期伴侣达尼埃尔·德费尔(Daniel Defert)掌握着他的笔记本和日记，还有他的个人图书室。至少有一个人拥有福柯谈“性变态”的那卷书的部分手稿，这是他写《性史》初稿时留下的。但他没有拿给我看，理由是福柯曾明确地要他允诺永不示人。更有甚者，在写作此书的这几年里，每年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资料，其中有些是非法出版、来路不正的。显然已出现了一个偷卖公共演讲录音带和自由转抄本的黑市，那里生意十分兴隆，许多出售品已为收藏家们所珍藏。我不知道当代还有哪一位哲学家的著作能导致如此活跃的黑市。

对比之下，关于福柯的二手资料总的说来都过于粗糙，任何对此有过研究兴趣的人肯定都会很快扔掉它们。这种二手文献令人厌倦，与福柯著作本身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为取得进展，我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装糊涂的态度。对于这一倾注了福柯毕生精力的事业，我倾向于用尽可能天真的眼光来看待，有意不加评判，只当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情。

还有其他一些障碍和潜在的陷阱，也须说个明白。例如，要考虑到叙述这样一个人面临着一种两难：他反复而系统地诘问关于“作者”的各种老式观念的价值，他对个人身份本身的特性提出了重大质疑，他出于天性而不相信探究隐私的提问方式和未经证实的诚实，然而他又倾向于在某种层面上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自传。

由福柯关于这类情况的看法所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不可能在一篇序言里得到整体的解决。这里仅举出这一点就够了：在最后，我不得不把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归于福柯。这种自我栖息在同一具人体里，与他凡人的生活共始

---

\* 马克斯·布洛德，1884—1968，捷克人，德语文学家，弗兰茨·卡夫卡的终生密友。曾违背卡夫卡的遗愿在他死后发表了他的大量手稿。——译者注



## 序

终,多少可以首尾一贯地说明他的行为和对人对己的态度,并把他自己的生活理解为一种按目的论方式构成的“探求”(若用法文表达,便是 *recherche*)。

用这种方式来讲福柯的故事,也许有悖于他最深刻的教诲。也许像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最近所说的,人们显然必须使用这种方法(即认为在福柯的内心里,在他所有的面具和信仰及表面变化的背后,有一种顽强而果决的自我)来探讨福柯的本质,这暴露了他的哲学的一个极大的局限性。或者,也许福柯本人从未持有那种没有道理的关于作者死亡和自我消失的观点(麦金太尔对这种观点的拒斥是对的),我相信这一点。<sup>③</sup>

为这位最不屈不挠的现代怀疑论者写传的每一位作者,都会面临着一些方法论的难题,这些难题,可惜没能在关于个人身份的探讨中获得彻底解决。因为福柯也对“真实”(truth)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这暗示着他自己的所有历史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虚构”之作。<sup>④</sup>

福柯对历史学的探讨引出了许多问题。这些总是饶有趣味,或许也非常难解。在序言里谈论这些问题当然也不恰当,但在这里说明一下我想玩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游戏”(借用福柯的用语)还是明智的。

在下文中,我遵照现代学术的惯例,用可以找到的证据来检验我的一些预感和想像的闪光。我在书后以尾注的形式附加了一个内容广博的注释,其中注明了每段引语和每一件轶闻的出处,并在适当的地方对一些含糊不明的事情进行了探讨,作了一些认真的斟酌。在做每一步工作的时候,我都讲究简洁,力求表达的清晰明快,即使我处理的常常是一些复杂的观点,有时还是一些玄奥的实践。最重要的是,我力图说出真实。<sup>⑤</sup>

我感到棘手的问题,的确大都是由这种真实所引起。读者很快就会发现,福柯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显得极其新颖别致、引人入胜,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他对于死亡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坚定不移的,同时极具含糊性和概然性。他不仅以他的写作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而且——我不无苛刻地相信这一点——还以施虐狂式的性行为这种深奥难解的形式,探索了死亡。尽管福柯自己对他的生活的这一方面有坦率的谈论,我在写书的过程中有时仍不能不感到惶惑,不知自己所作所为是否像某种不怎么光彩的宗教法庭判官。恰如一位美国批评家所尖锐指出的:“在一个不停地增生同性恋的意义,但又懂得如何在集体和个人中将它归于某种虚假无意识的文化里,很难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能



## 福柯的生死爱欲

显示出同性恋的意义,又看上去或感觉起来不像是警察设下的另一个圈套。”<sup>⑥</sup>

这还不是叙说真实所引起的问题的全部。更麻烦的是,艾滋病进入了故事,在我写的每一页书上投下了阴影,使我叙述的生活产生了一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我事前绝对不想看到的。福柯,因其对肉体及其快感的彻底探究,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幻想家;将来,一旦艾滋病的威胁消退了,男男女女们,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都会毫无羞耻或毫不畏惧地重复这种肉体试验的。正是这种肉体试验,构成了福柯独特的哲学探寻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我的书是在一场时疫的阴影下写的,而且首先将在这种阴影里被阅读——这一事实太容易令人们从一定程度上怀疑这种可能性了。

然而,可以杜绝后世生活中的轻浮和悲剧的诚实职业是不存在的。尽管危险很多,如被视为丑闻和化约主义、无意识的陈规老套和好色的官能主义,最后还有向敌视福柯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批评家们提供新的炮弹这种危险(这并非最不重要),我仍坚定地前行,力图尽我所能说出全部真实。

我的一部分宗旨是老式的:叙说真实从来就是历史作家的本分。

另一部分宗旨同样是坦诚的,尽管不大容易说明它的道理。从很多方面看,整整这一本书都是在为此提供证明。米歇尔·福柯好歹是20世纪的代表人物和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生活和他写作的文本是按一种可使二者相互佐证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细述他生活的全部涉及哲学的方面(无论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看起来是多么的令人震惊),不仅完全应该,而且非常重要。

我写本书还出于一种较具个人色彩的目的。我这人怀有这样一种令人不很愉快的信念,即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亚里士多德式的限度,什么柏拉图式的关于善的理念,什么隐含在我们的推理能力之中的道德罗盘,以及什么谋求意见一致的调节机制,好像靠这些东西我们就有可能消除各种生活形式之间的激烈竞争,就有可能协调它们那些尖锐对立的要求似的。故而尼采的哲学总让我感到困惑和愤怒,因为尼采的某些追随者犯有杀人暴行,而我又不能依据他的哲学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迄今无人能够驳倒)找出消除这种暴行的简便方法。

总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曝光之后,弄清“过一种深思熟虑的‘超越善恶’的生活”这句话的含义,就显得特别有必要了。而在这方面,除了研究福柯这位最富革命性而且极为认真的战后尼采派的生活之外,恐怕别无更好的办法。





## 序

当然,这决不是探讨福柯作品的惟一途径。他的书早就大获成功,同其他的经验领域、其他的智力类型发生了接触,在观念的碰撞中浮沉起落。正像所有时髦人物的遭遇一样,人们关于福柯也讲了许多胡说八道的话,并以他的名义干了许多胡作非为的事。但他仍应享有一定的声望,因为即使没有什么别的贡献,至少他在启发过多种开拓性的历史——哲学研究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例如,彼得·布朗(Peter Brown)那部令人称绝的、关于早期基督教时代弃绝性生活现象的再检讨之作《身体和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保罗·韦纳(Paul Veyne)在《面包和竞技》(*Bread and Circuses*)中对古罗马风俗制度的阐释,伊恩·哈金(Ian Hacking)探讨推理的统计学方法发展史的《驯服偶然》(*The Taming of Chance*),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关于19世纪法国工人的薪水和健康保险的研究著作《精明的国家》(*The Provident State*)等。这还仅仅只是一份长长的清单的开头,而且这份清单还在不断加长。

不过,这些研究尽管显示了福柯的著作在激励令人兴奋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研究方面的力量,最终却并没有使我们接触到这位哲学家的作品中最奇特(或许也是最令人不安)的东西。福柯在去世之前曾要求我们对它加以理解。

“每时每刻,每走一步,”他在1983年这样告诫说,“人们都必须把他们所说所说的同他们所做的,同他们的真实身份进行对照。”这就需要考察观念和存在以及梦想和现实的融合,或者说是甄别这种混淆不清。正如福柯建议的那样,解开一个哲人的个人诗意态度的钥匙并非在他的思想里可以找到的,似乎从他的思想可以洞悉他的态度;而是需要在他在生活式的哲学中,在他的哲学生活里、他的精神特质中加以寻找。

本书,即是为纪念米歇尔·福柯而记述的一种“哲学的生活”。

## 注 释

① “J. P. 理查的马拉美”(Le Mallarmé de J.-P. Richard),《年鉴》(*Annales*) (September-October 1964),第1000页。我的方法论主要借鉴于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的批判性著作,他重建卢梭一类人物的想像世界的方法,在我看来堪称典范。我的书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亚历山大·尼哈玛斯(Alexander Nehamas)在《尼采:文学式的生活》(*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1985)中关于“成为自己”(to become what one is)的意义的研究。



### 福柯的生死爱欲

② 参见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Michel Foucault*) (Paris, 1989)；英译本，贝齐·温(Betsy Wing)，(Cambridge, Mass., 1991)。没有艾里邦，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因为：一、本书叙述的大量事实，都是我第一次从他的传记里读到的；二、他亲自在好几个关节点上帮助我完成了工作；三、他无意中为我打开了一些门户，我能见到福柯的长期伴侣达尼埃尔·德费尔(Daniel Defert)，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不喜欢艾里邦的描述并希望加以纠正。至于戴维·马塞的书，我在写作时并未读到，因此很可能我的书一出版就需要修改，几乎每个章节都需要增订、充实和修正，请读者留意。

③ 参见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道德研究的三种对立观点》(*Three Rival Visions of Moral Enquiry*) (Notre Dame, 1990)，第 32—57、196—215 页。关于某种按目的论的方式建构的“探求”的观点(此观点结合了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和巴什拉尔运用的“recherche”要领的某些方面)，福柯早在 1957 年就表述过：参见“科学探求和心理学”(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t la psychologie)，载让—爱德华·莫雷尔(Jean-Edouard Morère)主编：《法国学者自问录》(*Des chercheurs française s'interrogent*) (Paris, 1957)。参见福柯关于目的论在伦理学中的作用的最后论点：UP，第 34—35 页；英译，第 27—28 页。广为流行的对于福柯态度(如果他的态度确实如此)的误解，无疑源自福柯自己：他在 60 年代末关于“作者之死”的一些故意嘲弄人的断言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就是说，真正实现了自我抹消和隐匿(我在本书第五章较详细地讨论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④ 在我看来，关于福柯历史哲学的最好表述是保罗·韦纳作出的：参见“福柯引起了历史学的革命”(Foucault révolutionne l'histoire)，见韦纳：《人们怎样写历史》(*Comment on écrit l'histoire*) (Paris, 1978)。

⑤ 利昂内尔·高斯曼(Lionel Gossman)文笔优雅的著作《在历史与文学之间》(*Betwee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1990)表现出一种对历史研究文学性的欣赏。事实上，我觉得我自己关于客观性要领的思考，就很受这种欣赏的影响。为客观性多费点力气是值得的(尽管这种理想显得可疑)，这一点已为神话贩卖活动肆虐(如在 1917—1989 年的俄国和希特勒德国所发生的那样)的现代经验所证实。

⑥ 米勒(D. A. Miller)：《推出罗兰·巴尔特》(*Bring out Roland Barthes*) (Berkeley, 1992)。

⑦ TFR，第 374 页。



## 序

某些物类,深不可测。他们是谁?他们的奥秘即深藏在生活奥秘之中。他们探索这一奥秘。生活杀死他们。但他们咕哝一声便唤醒了未来,而未来就察觉到他们,创造他们。哦,极端之爱,何其古怪!

——勒内·夏尔<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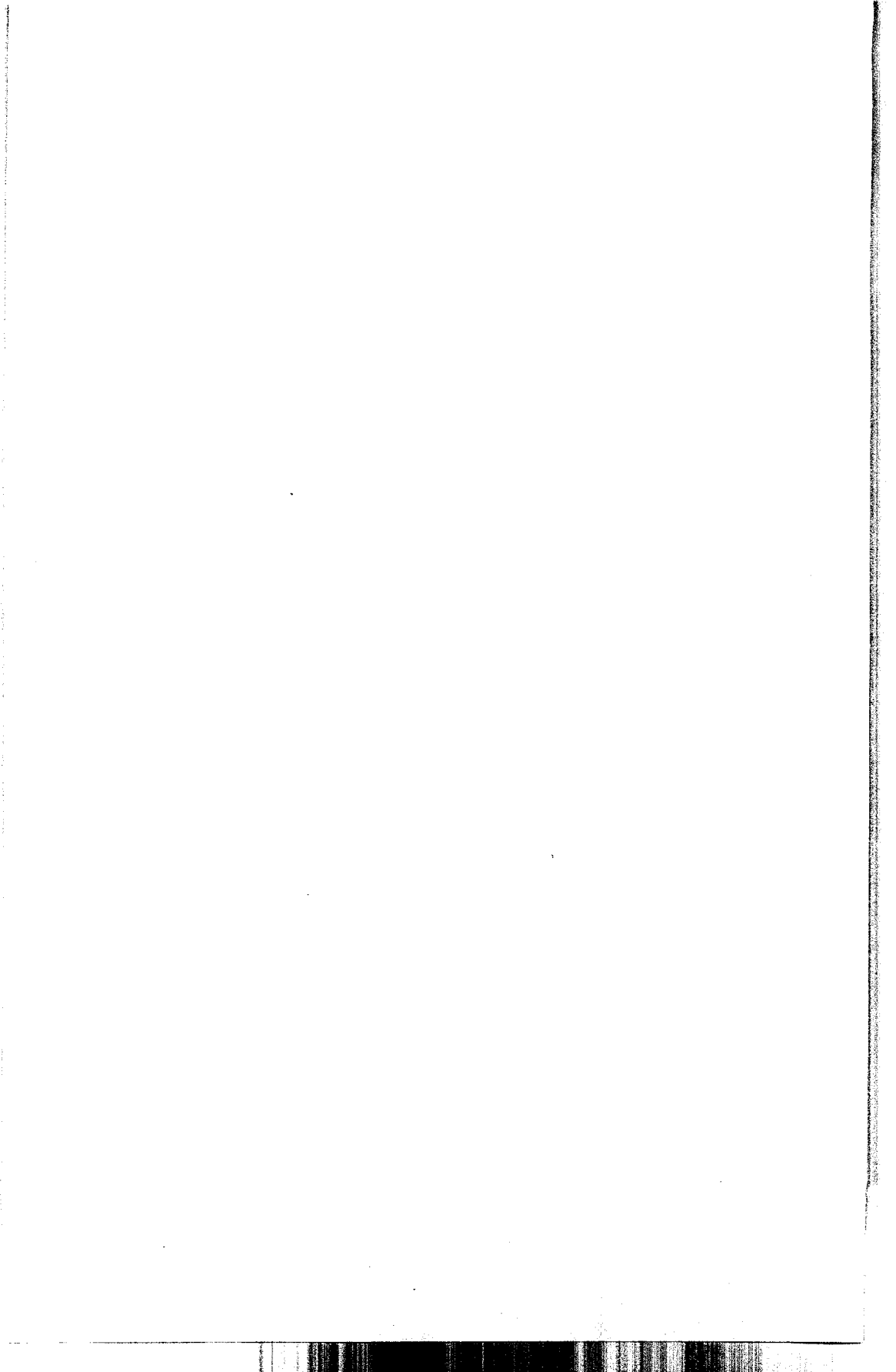
除我自己而外,没有人在和我交谈,我的声音在我听来就像一个垂死者的声音。就让我同你——可爱的声音,全部人类幸福的最后被记住的气息——谈话吧,即使现在不行,还须另择良辰。由于有了你,我自欺并不孤寂,自欺拥有多重性与爱情,因为我的心不敢相信爱情已经死亡。它无法忍受绝对孤寂的冰冷碎块。它使我不得不以两个人的方式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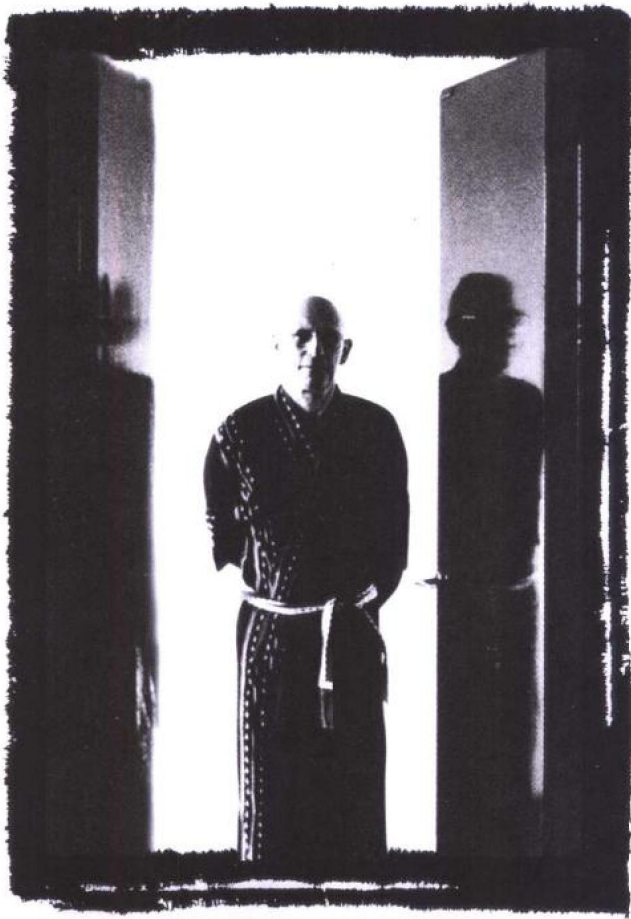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尼采<sup>②</sup>

## 注 释

① 勒内·夏尔(René Char):“致命的伙伴”(Le mortel partenaire),载《勒内·夏尔全集》(*Oeuvres complètes*)(Paris, 1992),第363—364页。

②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尼采全集》(*Werke*),诺曼(Naumann)编(Leipzig, 1894),第10卷,第147页。系尼采为他早期未写完的一篇文章做的一条笔记,但未使用。该文章也是他死后才发表的,载“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Tragic Age of the Greeks)(1873)。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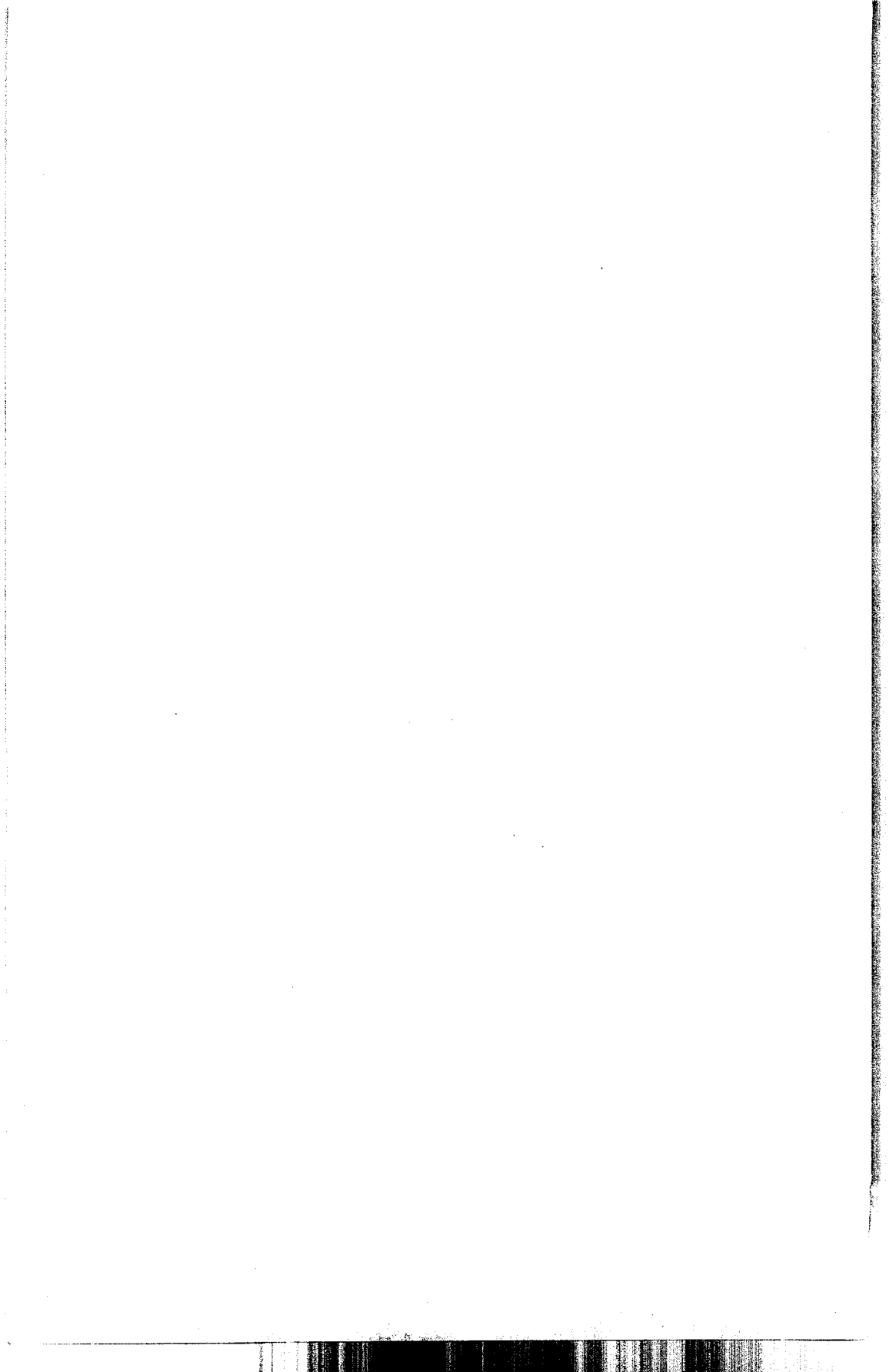
---

第 一 章

---

作 者 之 死

---



# 第一章 作者之死

**福**柯于1984年6月25日去世,享年57岁。其时,他或许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他的书、文章和谈话录被译成16种文字。社会批评家把他的工作奉为试金石。许许多多学术领域的学者们都在极力弄清他的经验研究的意涵,都在深入思索他提出的那些抽象问题,如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如道德责任的起源和现代政府的基础,如历史探寻的特征和个人身份的本质。十多年来,他那漂亮的光头一直就是政治勇气的标志。那是一颗闪亮的北极星,它指引人们向一切窒息自由精神和压抑“立异之权”的惯例制度进行抗争。由于他敏于批判,矢志于揭露权力的滥用,敢于响应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我控诉!”这一昔日的战斗口号,福柯在他的崇拜者的心目中,已取代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而成为理想知识分子的典型。<sup>①</sup>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们却盛传他在复原。当时他正年富力强,处于才能的巅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人们翘首以待的《性史》才刚刚又出了两卷。

在法国,他被视为国宝。总理为他的死发布了悼念讣告。《世界报》(*Le Monde*)、《解放报》(*Libération*)和《费加罗报》(*Le Figaro*)均在头版发布了 he 逝世的消息。《解放报》的周末版竟以十二版的篇幅出了一期特别副刊,详细介绍了这位伟人的生平和著作。举国上下的传播媒介都洋溢着一片赞誉之声。

在新闻周刊《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上,编辑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对福柯发出这样的赞叹:“他的才智宽广无垠,拥有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他的判断之严谨,有时几近苛刻。”著名古典学者保罗·韦纳称他的工作是“本世纪思想界最重大的事件”。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可能是法国当时还活着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颤颤巍巍地向福柯的亡灵致敬,称他为“他的时代最辉煌的思想家之一”。褒奖之辞铺天盖地而来,赞美者



### 福柯的生死爱欲

中既有学者和艺术家,也有内阁部长和正在变成老人的毛主义者,还有工会领袖和刑满释放犯。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明显的虚情假意,只需把这些赞誉之辞排列一下,就不难看出福柯在社会上拥有何等的影响了。<sup>②</sup>

由讣告可知,福柯是因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作而开始成名的。他在《疯癫与文明》(*Folie et déraison*)(1961年出版)中指出,人们对于精神错乱的看法在1500年以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在中世纪,疯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逛来逛去并且受到尊重,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却被当做病人关进了疯人院,一种“被误导的慈善”大行其道。这表面上好像是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开明的、人道的运用,可在福柯看来,实际上却是社会管制的一种阴险狡诈的新形式。这个论点更广的含义只是在数年之后才为公众所看清,因为那时福柯这本书已被一个“反精神病学派”团体奉为经典。拉英(R. D. Laing)、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早在1961年,一些杰出的法国批评家和学者就对福柯大胆的论点、高质量的学术和优美的语言,表示过赞赏。他的名望开始在法国上升。而随着1965年《疯癫与文明》英文版的问世,他又开始蜚声海外。<sup>③</sup>

第二年,即1966年,福柯发表了第二部主要著作——《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该书在法国引起轰动,成了一本令人瞠目的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他对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学、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发展作了大胆的比较研究。尽管常常不易读懂,但全书新词叠现,妙语如珠。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该书的最后一句话,它断然宣布“人”很快就会消失,“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福柯用这句话,像一个世纪以前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那样,预告了“人”的死亡。正是这句话所引起的争论,使福柯第一次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sup>④</sup>

但福柯的名望上升到顶峰,还有待于1968年5月事件发生之后。那一年全世界的学生都在造反,事后福柯便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恒常的热情。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例行公事般地评论时事、签署请愿书、参加游行示威,每遇不平即拍案而起,为所有可怜的、无权的人——如法国的囚犯、阿尔及利亚移民、波兰工联分子、越南难民等仗义执言。与此同时,他登上了学术声望的又一个新高峰:





## 第一章 作者之死

踏着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他自己的导师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后尘,他于1970年当选为法国最著名的学术研究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

在后来的这些岁月里,福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约就是他的那种“权力”概念。他公开承认尼采是他的榜样和先驱。像尼采一样,他所理解的权力,并非一定分量的物质力,而毋宁是某种在每个活机体和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这种能量流的无定形的流动受着许多条条框框的扼制,这些条条框框,除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组织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行为方式、内省习惯和知识体系。

他的《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于1975年在法国出版。这或许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了。在这本书里,他运用上述权力概念阐述了现代监狱的兴起。虽然他像通常一样使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但他那别出心裁、狂放不羁的论点又一次震动了人们。在监狱制度中注入“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的做法,实际上是个圈套:正因为它成功地柔化了体罚的外观,使其变得不再那么严酷,现代监狱才集中体现了一种谦和的、基本上无痛苦的强制,而这一般说来正是现代世界典型的强制形式。福柯抨击说,从学校到各行业,从军队到监狱,我们社会的主要惯例体制表现出邪恶的效能,极力对个人施以监控,“消除他们的危险状态”,通过反复灌输训诫条例来改变他们的行为,结果将不可避免地造就一些毫无创造能力的“驯顺的团体”和听话的人群。<sup>⑤</sup>

尽管福柯只是在这本书里才第一次明确地谈到权力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始终都是他关注的焦点之一。他的全部著作,从《疯癫与文明》开始,都围绕着同一个轴心,即一套杂乱纷呈的关系。人们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行使着权力——有时经过认真思考,但常常是肆意为之。经常在他的书里出入的人物们演出着一场象征无休止统治的寓意剧——从绞刑吏拷打凶手,直到医生禁闭狂人。

社会难道真的能够摆脱权力的魔爪而获得解放吗?所有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到萨特——都做过这种解放之梦。然而,如果认真读福柯那部无所不包(而且还未写完)的《性史》,我们就会发现此梦简直无从实现。在本书引起争议的第一卷(1976年出版)中,福柯驳斥了那种认为现代文化是性压抑文化的流行观点,但他提出的新观点却更加令人不安:行使权力的快感被逐出“驯顺团体”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在性幻觉中重现,爆发为“权力和快